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55

2011年12月1日

草地分裂，緣由何在？

雙石

背景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高原勝利會師。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縣）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6月28日，會議確立了兩軍合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方針，並於次日擬定了旨在打開北上通路的〈松潘戰役計劃〉。然而，在其後整整一個月裡，因張國燾等“解決組織問題”的延宕以及其他主客觀原因，致使原擬的松潘戰役計劃流產。7月下旬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後在蘆花（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蘆花鎮）、沙窩（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

縣血洛村) 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 “解決組織問題” 並修訂或重擬戰役計劃。8 月 5 日, 沙窩政治局會議決定放棄松潘戰役計劃, 改取旨在 “迅速北進夏河流域, 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 向東壓迫敵人, 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 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¹ 的〈夏洮戰役計劃〉, 一、四方面軍分左、右兩路, 經阿壩、毛爾蓋分途北上。

1935 年 8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爾蓋(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上八寨鄉索花村寺廟內) 召開政治局會議, 會議對沙窩會議後張國燾又提出西出阿壩北上向青甘邊緣地區退卻的主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形成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 更加明確地指出紅一、四方面軍主力當前的行動方針: “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 地區, 並依據這個地區, 向東進攻, 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 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²

從 8 月 18 日起, 右路軍部隊開始分兩路北上, 進入水草地。至 8 月下旬, 相繼進至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區。與此同時, 發現了紅軍有穿越草地跡象的國民黨軍也開始行動, 26 日, 第 49 師伍誠仁部奉胡宗南令, 由漳臘(今川主寺東北) 出發, 翻越弓楨嶺雪山, 沿松甘驛道進入包座河谷, 增援在班佑、巴西、阿西茸、求吉寺地區的補充旅康莊團及游擊支隊。

這路進入林區的敵軍實際上與正在水草地行軍的紅軍右路軍形成了平行北進之勢。

¹ 〈夏洮戰役計劃(1935 年 8 月 3 日)〉,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 第 95 頁。

² 〈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1935 年 8 月 20 日政治局會議通過)〉,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126 頁。

此間，左路軍先頭部隊已從卓克基、大藏寺地區北上，擊潰了阿壩土司楊俊扎西的藏騎武裝，進至查理寺、阿壩地區，一部進至嘎曲河西岸的安曲（哈拉瑪）附近籌糧。

8月底，進入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區的紅軍右路軍主力向盤踞該地區的敵補充旅康莊團和“游擊支隊”盤踞的班佑寺、卓藏寺（當時譯作“腳仗寺”或“覺大寺”）、求吉寺（當時譯作“救濟寺”），以及進至上包座地區的第49師伍誠仁部發起攻擊。至9月1日，將敵軍大部殲滅，佔領了除求吉寺、卓藏寺外的敵軍據點。

此後，中央政治局和右路軍徐、陳首長屢屢電催朱、張首長率左路軍前來與右路軍會合，迅速北出甘南。9月初，左路軍先頭部隊陸續經甲本塘（當時譯作“箭步塘”）向嘎曲河開進，朱、張所率紅軍總部也進至甲本塘。但已另有所圖的張國燾始終藉故拖延，最終決定要挾黨中央率右路軍“南下”，並令已到達嘎曲河西岸的左路軍先頭部隊返回阿壩。9月8日，張國燾電令駐馬塘一線的紅31軍政治委員詹才芳：“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所率人馬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聽則將其扣留”。³9月9日，“密電事件”發作，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來駐地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單獨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團北上……

數十年後，這個原本已有定論的重大歷史事件，因那封著名的“密電”迄今沒有找到原件文稿，引起一些歷史當事人和學者的置疑，產生出了“草地分裂責任誰負”的問題，甚至還衍生出了“毛澤東、葉劍英合謀栽贓張國燾”的奇談怪論來。如此，我們就不得不對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再一次進行認真嚴謹的考量和清

³〈張國燾關於扣留軍委縱隊致詹才芳的電令（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669頁。

理，以正視聽。

“北上”與“南下”，爭的究竟是什麼？

這個問題近 30 年來不斷有人提起，無非是“北上”與“南下”不過是發展革命力量爭取革命勝利的的方法和途徑問題，談不上誰對誰錯。甚至還有人搬出了張國燾回憶錄中“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爾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⁴的話作為依據，來否定“北上”和“南下”的政治原則和路線之爭的實質！

其實，這個問題，作為重要歷史當事人的徐向前說得極其透徹和明白：

黨的北進方針，不是隨心所欲的決定，而是基於一定的歷史環境和黨所面臨的任務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昇，並變動著國內階級關係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繼武裝侵佔我東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爾省北部後，進而製造“華北事件”，發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和冀東“自治”，公然聲稱要獨霸全中國。“落後”的北方，一掃萬馬齊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濤。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僅愈益被廣大人民所反對，同時也引起了統治階級營壘內部一些愛國人士的不滿。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從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保存和發展紅軍力量，使黨和紅軍真正成為全民族抗日鬥爭的領導力量和堅強支柱這一基本目的出發，確定北進川陝甘地區，創造革命根據地，進而發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勢，是完全正確的。

⁴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 2004 年，第 521 頁。

毛澤東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條件時，就明確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夠利用陝北蘇區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協同配合，短期內形成鞏固的根據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區和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第二，在敵情上，這個地區的敵人分屬幾個系統，互相之間存在著矛盾和衝突，戰鬥力一般較薄弱，並遠離其政治軍事中心，便於紅軍各個擊破。尤其是東北軍張學良部，反帝與不滿蔣介石的情緒日增，正是紅軍開展爭取工作的有利條件。第三，在居民條件上，由於連年不斷的深重農業危機，普遍的饑荒，沉重的捐稅和土地在地主手裡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長著農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鬥爭。第四，在物質條件上，川陝甘邊是西北比較富庶的區域，能夠保證紅軍現有力量及今後發展的需要。基於上述條件，黨和紅軍集中兵力，乘間北進，在川陝甘邊立腳，建立起可靠的前進陣地，就一定能夠影響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與此相反，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

……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⁵

一句話，北上與南下，是革命事業生存還是消亡、發展還是

⁵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303~305、318頁。

削弱的大是大非問題！

徐向前的這番話，是有鐵的事實為依據的——中央紅軍北上的發展，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挫折，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還不能成為有力的佐證？至於張國燾用以自辯的“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爾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那只是個貽人笑柄的夢囈！——即或從“無過推定”的前提出發而不對此言作“立場”和“路線”方面的過多批評，這位“張主席”也實在是太健忘了——或許因為身在國外無法查閱當年的原始文獻資料作參照之故？當時黨中央在沙窩會議和此後毛爾蓋會議上擬定的“北出陝甘”的方針是一個“川陝甘計劃”，具體而言就是全軍進至夏河洮河流域與敵決戰並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方針，向陝北或陝南或川北發展只是夏洮戰役計劃實現後依託“以岷洲為中心的根據地”的“下一步方針”。當時這個地域敵軍力量薄弱，人口較多產出相對豐富，紅一、四方面軍集全軍之力打出實現這個計劃的勝算極大，相較於“南下”或“西進康北”，“吃飯問題”也更容易解決！而黨中央在俄界會議上之所以決定直奔陝北，那是因為僅幾千人馬的中央紅軍一、三軍團已無法獨立完成“夏洮戰役”與敵決戰的計劃，落難之人投靠窮親戚那是別無選擇！

再者說了，“張主席”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間的幾度徘徊，“早就餓死了”多少人？

其實更為可悲和可笑的還是當代人：有些二百五“磚家”“學者”不從“全部事實的總和”中去細作研判，卻在“張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辯中尋章摘句找來這句話要為“張主席”洗清“冤枉”，還印成了鉛字兒，擺出一副要“還歷史於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無意地硬要把“張主席”的頑冥不化固執己見與

紅四方面軍廣大將士奮鬥經歷混作一談！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面對紅四方面軍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紅色英靈的——這些人中好多就是紅四方面軍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嘆啊可嘆！

數十年後，還有人這樣為張國燾辯解，張國燾南下是逃跑，黨中央北上也是逃跑，都是逃命，沒有什麼誰對誰錯！可問題是，黨中央是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突破重重封鎖，向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帶“逃跑”呀！這是要在民族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去“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同時也為黨的生存和發展尋找機會呀！黨中央這是認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去，才有建立、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更多更好的機會，才有讓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中間勢力認識和接受黨的方針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機會，黨也才有求得生存發展的更多更好的機會！在民族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上高揚“抗日救國”的旗幟，與置身於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國的口號，無論從行為效果還是從生存機會上來考量，難道是可以同日而語的麼？

而對於“在民族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去尋找生存發展機會”，張國燾從來就是沒有決心與信心的，他的逃跑，是逃避民族革命鬥爭的大環境大方向，逃向偏安託庇之所！對此，原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鐘的一段回憶說得非常清楚明白：

張國燾口頭上贊成統一戰線策略，實際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向日寇加速全面進攻和全民抗日運動繼續高漲的條件下，國民黨及其軍隊大部或全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見到《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他說這像是韓愈的《祭鱷魚文》，是不著實際的幻想；他還指責黨中央提出成立國防政府，是重複法國鎮壓巴黎公社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口號。弼時同志針鋒相對地駁斥他的

謬論，批評他根本不相信統一戰線，不曉得如何估計階級力量的變動；給他指出，不能看到紅軍數量比過去少了就以爲整個形勢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這是機械唯物論的錯誤觀點。張國燾本來沒有一點理論，更不接受馬列主義理論，立刻搶白說：“機械唯物論總比唯心論好一些。”他不可救藥到這種地步。

本來，朱總司令是主張四方面軍不要在甘南停留而徑直跨過西蘭公路去會合一方面軍的。後來陳昌浩也提過，四方面軍向隴東北前進。張國燾則相反，總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恥地說：“打日本不是簡單的。我們現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見得一定能打贏它。我們只能將西方變爲蘇維埃的後方，做前方抗日紅軍的後備軍。”朱總司令嘲笑他膽子太小了，說：“四川軍閥打仗是溜邊的，碰上敵人繞彎彎，見到便宜往前搶。國燾同志你莫要溜邊邊呀！我們長征是要到抗日的前進陣地，紅軍要成爲抗日先鋒軍、模範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綏遠、寧夏進攻，敵情在北面，你老想向西去，當然打它不贏，只是跑得贏了！”⁶

不可同日而語啊不可同日而語！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派性戰勝了黨性， 是黨中央被迫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主要原因

“北上”與“南下”既然是路線之爭、原則之爭，黨中央當然要堅持。更何況，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多次形成了黨內決議的，每一個黨員都有義務維護之貫徹之，而不是相反！更遑論憑著手中槍桿子的多少，去推翻黨的決議——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⁶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76~777頁。

然而張國燾偏偏就真冒了這個天下之大不韙！

1935年8月初的蘆花、沙窩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分左、右兩路軍分途北上之後，率左路軍進至阿壩的張國燾又再度萌發過“西進青、新”之念。為此，黨中央於8月20日在毛爾蓋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並以毛澤東發言為基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明確反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寧”。中央領導人和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也曾多次致電張國燾，解釋中央北上方針，對張國燾進行規勸：“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⁷“……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隊，不應以主力前往”，⁸“……不宜分兵出西寧”，⁹“……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寧不當……”。¹⁰

於是，張國燾在一番左扭右捏之後，又選擇了“南下”。

應該說，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陳昌浩等人是贊同中央北上方針的，此間也曾不斷去電解釋中央意圖，勸說張國燾執行黨中央北上決議，這當然是值得歷史記取和肯定的。但是，我們也無法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張國燾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強硬要求下，徐、陳首長在“黨性”與“派性”的最後抉擇上，還是沒能守住“黨性”的底

⁷〈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7頁。

⁸〈中央政治局就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致張國燾電（1935年8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33頁。

⁹〈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執行向洮河東岸發展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8頁。

¹⁰〈陳昌浩、徐向前關於以岷州為根據地向東發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21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9頁。

線，最終屈從於“派性”，改變了原來贊同“北上”的態度，轉而要求黨中央服從張國燾的意旨，放棄北上方針而轉道南下。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一年之後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會師後任弼時曾向傅鐘瞭解年前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緣由。當時情景，傅鐘留下了回憶文字：

任弼時同志是敏於事而慎於言的，聽過我講的過程，嚴肅地問我：“北上有決議沒有？”

我說：“有。”

“有，為什麼不執行？”

弼時同志這個提問，一針見血，刺中我的思想深處。儘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還是不由得冒出了汗。關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戰略方針，在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毛爾蓋會議上，黨中央都作了決議或補充決定，其中有兩個會議我也列席在場，但卻沒為執行和維護它進行堅決鬥爭。這是我終生難忘的過失。後來我多次為此作過自我批評。¹¹

任弼時當年在中央蘇區時，曾積極參加過批判毛澤東。從長征這個歷史時期來看，他也談不上對毛澤東有多麼深刻的認識。但任弼時身上卻有著一個共產黨人最為重要的品質：堅強的黨性！正是這種堅強的黨性，使他在歷史的重要關頭，作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的當然選擇！

兩相比較，我們不能不扼腕嗟嘆——不能不承認，人與人之間，還是有差距的！

¹¹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7頁。

對此，徐向前在多年後的回憶文字中，有過這樣的檢點：

列寧說過：原則的政策是惟一正確的政策。原則的分歧，不能退讓，不能調和，只能通過鬥爭去解決。但是，由於我的水平不高，當時沒有從原則上、戰略上的高度去看“北進”和“南下”之爭，更沒有識破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因而當鬥爭尖銳化、明朗化的時候，彷徨困惑，心情焦慮，仍然寄希望於中央能夠說服張國燾，帶著左路軍一道北進；實在不行的話，寧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結果跌了跟頭。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¹²

徐向前這些話，都是在毛澤東去世多年後改革開放年代道出的。

據徐向前自己回憶，1935年9月9日，在張國燾明確而堅決表示反對北上後，“陳昌浩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我不願把四方面軍的部隊分開，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駐地反映我們的意見，回來很不高興，說是挨了一頓批評”。而當日晚上，毛澤東到徐向前的住處單獨向其徵詢意見時，徐的回答是：“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分成兩半恐怕也不好”。¹³

無論話說得多麼委婉，作為晚生後輩的筆者都不得不冷峻而直白的道出——

這是宗派的立場，而不是黨性的立場！

這當然也與當時的徐向前、陳昌浩對黨的北上方針缺乏深刻的認識有關，毛澤東在俄界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曾經指出：

¹²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3~305、318頁。

¹³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2頁。

張（國燾）到阿壩後，便不願意北上，要右路軍南下，政治局七個同志（徐、陳在內）在周副主席處開了一個非正式會議，決定給電張國燾北上，徐、陳當時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鈞、毛炳文，走草地沒有王鈞、毛炳文，這是他根據的機會主義觀點。所以，張國燾堅決要他回去，他便主張回去。¹⁴

也就是說，當時徐、陳支持黨中央北上方針，只是不願意回頭再過草地，但對北上可能會遭遇國民黨中央軍的王均、毛炳文部，他們也缺乏戰而勝之的信心。兩相權衡的結果，還是選擇了執行張國燾的意圖。

王均當時為國民黨第三軍軍長，毛炳文為國民黨第37軍軍長，該兩軍各轄兩師（兩旅四團制師），為中央軍旁系（半嫡系部隊）。兩軍加起來不到五萬人，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北上時的全部力量有近十萬人。

十萬紅軍竟然要躲著五萬敵軍，這還不算是“逃避鬥爭”的“逃跑主義”麼？

後來的事實是，黨中央率領不過七千多人的一、三軍團，照樣北上了！

我們還不得不指出是，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在“北上”與“南下”之爭的關鍵時刻改變了原有的態度，黨性向派性投了降，才是黨中央不得不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主要原因！那個因找不到原電文稿而讓後人們紛爭不已的“密電事件”只是一個誘因！有了這個“主因”，即或沒有這個“誘因”，黨中央恐怕也不得不考慮“單獨北上”，只不過不會走得那麼匆忙那麼急迫而

¹⁴ 〈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50頁。

已！後人放過主因而糾纏於誘因，那是大有“攪渾水”以迴避關鍵問題之嫌的！

何凱豐在〈黨中央與國燾路線的分歧在哪裡〉一文中寫道：

北上的戰略方針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不經過中央政治局，是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改變這種方針的。國燾身為政委應當堅決執行黨中央的命令，可是國燾卻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變這一戰略方針，這還有什麼政治委員的資格？在二，四方面軍達到甘南時，當時的西北局決定北上會合一方面軍，國燾也可以不執行西北局的決定，私自改變為向西開進，如果照國燾這樣做去，還要黨做什麼用處？黨還有什麼作用？以這樣一個糊塗的政治委員怎樣還能去加強黨在紅軍的絕對領導，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中，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¹⁵

看見沒有，“他下面的幹部”已經叫出了“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中央還呆得住麼？

當然，從治史角度而言，誘因的真偽也的確是需要探究明白！

“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密電是否存在？

這份“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密電因迄今找不到原件文稿，也成了一些人否定其存在的理由。

找不到原件文稿這個最直接的物證，的確難以作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定論來。但沒有“直接物證”是不是連案都不能判了

¹⁵ 何凱豐：〈黨中央與國燾路線的分歧在哪裡（1937年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111頁。

哩？不是還有其他人證、旁證和其他間接證據麼？更何況，這個最直接的“物證”找不到，責任也不該由黨中央來負呀？這份密電，是從紅軍總部發給前敵總指揮部的，這個“物證”也只能留存於紅軍總部和前敵總指揮部（也就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而這兩個指揮機關當時乃至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在黨中央掌控之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西渡黃河最後歸於失敗，失敗的最後關頭連電臺都砸了，譯電員犧牲，電報也基本銷毀，肯定是找不著了。那僅存的物證就只能在紅軍總部的存留電報中尋找，如果找不著，那至少需要考慮“為什麼找不著”，而沒有理由直接判定這個電報“不存在”！——同時期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留存下來的電報和文獻還有很多，是不是僅僅因為“找不著”，就能斷言其不存在哩？比如，在目前公佈的電報中，不也沒有“密電事件”發生的9月9日直至9月12日徐、陳向張國燾報告黨中央出走的電報麼？在這份其存在應該是毫無疑義的電報上，究竟有些什麼內容哩？

在當年的右路軍中，除了已經犧牲了的譯電人員外，葉劍英、毛澤東是最早看到這份密電的當事人和見證人。

葉劍英自不必言，毛澤東此後也沒把這份密電的內容藏著掖著密而不宣——就在一年多以後的1937年3月3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張國燾的面就談到過這份密電：

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¹⁶

¹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25頁。

當時在場的張國燾對與會者們提出的諸多問題都有自辯，但對毛澤東所言的這份密電，卻沒有表示任何異議，甚至以後在海外撰寫的回憶錄中也未置一詞。這說明了什麼？至少能說明張國燾自己也認為這份“密電”的存在是無法否認且難以自辯的——當時的他，肯定無法預料到一些後人還會因“找不著這份‘密電’”而生出了一場要為他“伸冤”的官司來！

再者，如果這份“密電”不存在，那麼最直接的邏輯導向就是葉劍英個人或與毛澤東合謀偽造了這份“密電”，而這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很難令人置信的：就算他倆都屬某些顛覆學問者認定的“陰謀家”，他們有什麼理由非得這麼做？難道這段日子裡中央上上下下對“張主席”製造的種種麻煩種種糾葛還沒有領教夠？還不足以激勵起“我們先走一步幹起來再說”的氣性兒來？非得整出一個匆忙出走還被迫拉下了許多同志甚至親人的“狼狽逃跑”來？

實際上，在“密電事件”發作之日前 22 時，黨中央在與右路軍徐、陳首長聯署的致張國燾的電報中就已經婉轉地表達了“如果四方面軍不願意北上，黨中央擬率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的意圖：“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仍空虛，弟等並擬於右路軍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 25、（2）6 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面）”。¹⁷ 其時，紅一軍團主力已進至拉界（那蓋）、俄界（高吉），先頭紅一師已進至白龍江峽谷的旺藏寺，正擬向前探路前進，而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部隊要根據“張主席”定奪作取捨。如此，這個“右路軍抽出”之“一

¹⁷ 〈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1935 年 9 月 8 日 22 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 667~668 頁。

部”，最有可能的不就是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部隊麼？試想，如果不是情況萬分急迫，已經向張國燾表達了“先行北上”意圖的毛澤東等，還有什麼理由非得整出一個“假密電”來自己嚇自己？

更何況，時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的葉劍英對當時部隊的分佈情況和部署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知道黨中央秘密而緊急地率一、三軍團單獨出走所面臨的鉅大風險：紅一軍團已經先行一步，黨中央身邊只有紅三軍團、幹部團和軍委縱隊。紅四方面軍四軍部隊部署求吉寺監控守敵，實際上也擋在了黨中央從達拉溝這條棧道直接去俄界的路上。黨中央率三軍團只能從阿西茸~扎公果~卓藏寺~那蓋（拉界）這條迂迴路上去俄界，紅四方面軍四軍部隊只要經達拉溝棧道這條捷徑進至達拉附近，就完全有可能迎頭堵住黨中央的去路，紅30軍在喇嘛嶺上的警戒部隊也可以直接取捷徑進至白龍江峽谷扼阻黨中央北上。毛澤東、葉劍英怎麼就那麼自信此番出走一定能成功？萬一不成功，首先有可能死在“自己人”槍下的人會是誰？

對於這種風險，黨中央也是有預見的。彭德懷曾回憶，當時他曾問毛澤東，緊急情況下可不可以扣人質。毛澤東說不可，真要如此，那就只好跟他們南下，他們總會覺悟的。而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性命或許還可暫時無憂，但葉劍英可就難說了——且不說“密電”，就憑他帶走了前敵總指揮部的地圖這一條“罪狀”而陳昌浩、李特又確曾派人來追殺的事實，就足以讓他性命難保了！

若非特別緊急的情況，“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會刻意去整出一齣驚險傳奇來？

還有，在黨中央向張國燾表達了“擬於右路軍抽出一部，先行出動”這個意圖的同時，張國燾也直接電令右路軍徐、陳首長：

“一、三軍暫停留向羅達進，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¹⁸ 次日 10 時，他就已經在向倪志亮、周純全部署南下具體事宜了。¹⁹ 而右路軍徐、陳首長也因此改變了態度，當日 13 時他們也基於這個“改變了的態度”電令林彪、聶榮臻：“一軍不要過於突出，應在現地域集結整理，並加強偵察”，²⁰ 還向黨中央表示了“一起南下”的意見。但徐、陳卻無法像命令林、聶那樣向黨中央下命令，如此，“張主席”電示徐、陳裹脅黨中央南下，以“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方式脅迫黨中央服從自己的意旨，不是有著順理成章的當然邏輯指向麼？

而憑著“人多勢壯槍桿子硬”這一張底牌，“張主席”似乎也有理由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以裹脅黨中央南下抱有信心——9月10日，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紅旗》附刊第1期中，〈為爭取南下每一戰役的全部勝利而鬥爭！〉的文章就已赫然刊出——該文聲稱：“南下戰略方針已經定下來了”，“一切誇大敵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喪失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企（圖）逃跑到偏僻地區的傾向，是我們目前主要的危險，必須開展無情的鬥爭”，²¹ 然而卻沒有“毛周張博右傾逃跑”的具體“罪責”指向，顯然該文是擬就於張國燾等得悉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單

¹⁸ 〈張國燾關於紅一、三軍停止北進、準備南下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令（1934年9月8日2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6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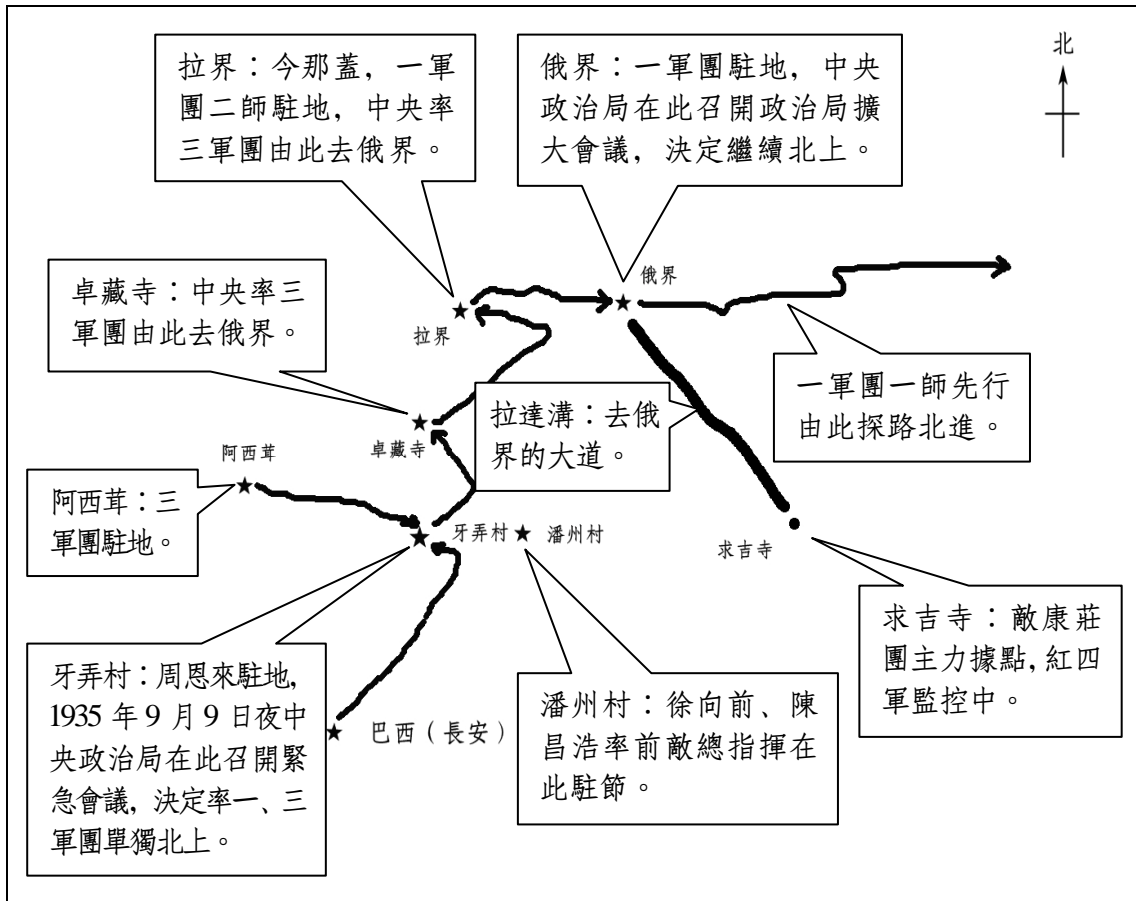
¹⁹ 〈張國燾關於南下部署致倪志亮、周純全電（1935年9月9日1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70頁。

²⁰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紅一軍應在現地集結整理致林彪、聶榮臻電（1935年9月9日13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71頁。

²¹ 〈為爭取南下每一戰役的全部勝利而鬥爭！（1935年9月10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86~787頁。

獨北上的消息之前，這不是正好說明了張國燾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預有籌劃和充分信心麼？

圖~1：中央紅軍單獨北上示意圖



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

還有人死摳字面，說這封密電內容是“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並非“武力解決”，那只能是拿不上檯面兒的一種狡辯。試問，“下面幹部”已經在喊出了“武力解決”，徐、陳又已表明了要中央一起南下的態度，“槍桿子指揮黨”的客觀態勢已經形成，這“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還能是溫情脈脈的麼？

據原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鐘回憶，“密電事件”的次年

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北上後，任弼時曾特許他到總部機要科去看電報，而且是“凡我看過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鐘看完所有電報後，任弼時曾經與他有過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關於這次談話，傅鐘留下了這樣的回憶文字：

看過電報才知道，原來在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後，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時同志打破張國燾的封鎖，我還是被蒙蔽著。比如：中央率一、三軍團到俄界後，不僅等了三天，來電七次，規勸張國燾放棄“南下”，跟隨北上，而且直到9月18日，彭德懷、聶榮臻同志等還致電張國燾，告知他們已佔領甘南的大草灘一線，當地的物資豐富，漢、回民眾熱烈擁護紅軍，“請你們立即北進”。顯然，中央一直是堅持兩河口會議精神，希望、等待並準備接應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對爭取張國燾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義盡。所以弼時同志再次和我長談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

這對我啓發很深，徹底分清是非。

……

後來，弼時同志沒有爲此批評哪個同志。對我則非常誠懇地說：“按照列寧的黨性原則，我們不是不參加黨內鬥爭。必須考慮到，我們是拿槍的，彼此都帶著隊伍！意見有分歧不好搞鬥爭的！我們還在長征當中，艱難困苦，人間罕見，團結一致比什麼都重要。”他的這些話貴如金石，在我心裡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不僅使我經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會引起新的震動。²²

任弼時“貴如金石”的這段話，其實已經回答了“‘徹底開

²²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7~777頁。

展黨內鬥爭’非‘武力解決’”之辯！

而且，還為“密電”之存在提供了一個間接佐證。

“密電”還有一個間接的佐證，那就是在“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密電發出的前一天，張國燾還有一個致紅 31 軍政治委員詹才芳的密電，這份密電的原文如下：

才芳：

甲、91 師兩團，即經梭磨直到馬爾康、卓克基待命，須經之橋則修復之。望梭磨、康貓寺路，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所率人馬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聽則將其扣留，電復處置。

朱、張
8 日²³

這份電報引發的歧義很多，作出判讀需要祥析相關地理要素。

當時詹才芳所率紅 31 軍駐馬爾康、卓克基、梭磨、康貓寺地區（即今刷經寺附近），蔡樹藩率軍委縱隊在右路軍左翼部隊行軍序列的後尾，此刻實際上已經進到巴西、阿西茸地區，若要返回馬爾康、卓克基地區，需要 7~10 天行程，除了重過草地外，還要翻越打古、昌德、長阪三座雪山。所以電文中才有“如其聽則將其扣留”——如果蔡樹藩“不聽”，詹才芳是無法將其“扣留”的！

因為軍委縱隊當時位於右路軍左翼部隊行軍序列的後尾，並沒有跟黨中央在一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是和徐向前、陳昌浩的前敵總指揮部一起隨右路軍右翼部隊行動的²⁴）。而黨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之前，一直是通過徐、陳前敵總指揮部的電臺與

²³ 〈張國燾關於扣留軍委縱隊致詹才芳的電令〉，《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 669 頁。

²⁴ 〈聶榮臻關於部隊行動情況致林彪電（1935 年 8 月 22 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 641 頁。

朱德、張國燾聯繫，軍委縱隊的電臺並未開機工作。張國燾當時有可能據此判斷：軍委縱隊尚在草地行進途中，並未到達巴西、阿西茸地區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會合。所以，才發出了這份“追回軍委縱隊予以扣留”的電報。

這份電報雖然仍然無法確證“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那份“密電”的存在，但至少能夠證明：張國燾的那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是包括了“扣留”這類強硬措施的，不是什麼溫情脈脈的友好商榷與商洽！自恃人多勢壯的張國燾，那就是要把黨中央當漢獻帝，這個狼子野心，那是怎麼藏也藏不住的！怎麼賴也賴不掉的！雖然只要找不到密電電文原稿這個直接的物證，總有人會否認其存在。但這當間有關的旁證、佐證形成的邏輯指向鏈條，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著而且相銜緊密，這也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數十年後，還有人孜孜於草地分裂的“責任是否全在四方面軍”的心結，這實在令人扼腕嘆息！草地分裂的“責任是否全在四方面軍”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黨中央從來就沒有說過草地分裂的“責任全在四方面軍”，這筆責任賬從來都是算在張國燾頭上的，既或對當時以宗派立場表態的一些歷史當事人，中央也從來沒有清算過他們的責任賬。黨中央從來都是把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將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無論是對張國燾個人，還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黨中央都做到了“仁至義盡”，這是改變不了的歷史事實！如果硬要把紅四方面軍與張國燾個人混為一談，那既是在開歷史的玩笑，也是在開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責任，再怎麼算，難道還能算到中央頭上來了？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葉劍英將密電送回陳昌浩後，沒有證據表明陳昌浩或徐向前對黨中央作出了相應的臨控部署，這或許是陳昌浩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沒有產生出張國燾所希冀黨中央

所擔憂的敏感來，也或許是他們對黨中央寧肯單獨出走也要貫徹北上方針的決心和魄力估計不足，這也是黨中央率一、三軍團順利北上的重要緣由之一。而“密電事件”發作時，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在是否派兵追回黨中央的問題上守住了最後的底線：紅軍不打紅軍！這也應該是一個不可更改的歷史性功績和歷史性貢獻：從當時黨中央出走路線與右路軍中紅四方面軍的分佈位置來看，徐、陳要想追回或攔截中央，也是完全有可能辦到的！如此，紅軍內部親者痛仇者快的武裝衝突，當然也就在所難免了！

關於這一點，黨中央乃至毛澤東本人，從來都是記得牢牢的！也是載入了諸多權威史籍典冊的，即或是在文革時期，也多次提及！而對於徐、陳在“密電事件”前前後後那些基於宗派立場的錯誤表態和對一方面軍指揮員的策反信函，反而是從不提起、從不計較，更遑論見諸於史籍典冊！

天日昭昭，耿耿此心，還有什麼可以置疑的哩？

黨中央為謀求和維護黨內團結 釋放了最大誠意表現了最大耐心

在“草地分裂”前後，黨中央為謀求和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釋放了最大誠意，表現了最大耐心。這樣的歷史事實，恐怕就是如今那些熱衷於做顛覆學問者也難以否認的！在兩軍會師之際，張國燾、陳昌浩等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軍幹部點著官銜為“張主席”要官位，可以擁兵自重，對自己已經同意了的作戰計劃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變行動方向要求中央服從自己，而中央卻只能婉言相勸，耐心說服。在“北上”與“南下”之爭白熱化明朗化的時候，中央還一一徵詢右路軍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意見，

在得到了基於宗派立場而不是黨性立場的回答，從而使所有這些努力無效的情況下，中央還派人送出信函發回電報，力勸右路軍領導人跟隨北上。請問中央還要怎麼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據郭化若回憶，當時他曾奉毛澤東命向紅四方面軍部隊送出了一封信函：

……我走在隊伍最後面，毛澤東招呼我過去，從袋子裡拿出一封信來說：“化若同志，你在這裡等一下（因為前面有岔道），紅四方面軍工兵營的營長來了，就交給他。”我知道這是張國燾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風險，在一、四方面軍分道揚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將這封信交給我轉交，這是對我的信任。我說堅決完成任務。原四方面軍的一些同志順原路南下，人家臉上表情很簡單，默默不語走著。約莫個把鐘頭過去，見一些扛著大斧、鐵鍬的隊伍走過來，我一打聽果然是工兵營，很快找到營長，我把信拿出來，他聽說是毛主席叫我轉交給他的，立正用雙手捧了過去。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²⁵

這份〈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的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志們：

自從我們翻越了雪山，通過了草地之後，我們一到包座，即打了勝仗，消滅了白軍 49D（師）。目前的形勢是完全有利於我們，我們應該根據黨中央正確戰略方針，繼續北進，大量消滅蔣介石、胡宗南的部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

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眾完全逃跑的少數民族地區。兩個月來，我們在川西北地區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裡？南下

²⁵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第 107 頁。

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斷路。

同志們，只有中央的戰略方針是唯一正確的，中央反對南下，主張北上，為紅軍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你們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中央²⁶

在這個〈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中，黨中央只是強調北上方針，並沒有刻意渲染黨中央高層的分歧，更沒有指名點姓的批評與批判，其用心之良苦可窺一斑。而且在抵達俄界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形成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的決議中，中央雖然也很嚴肅地道出了“他對於黨的中央，採取了絕對不可容許的態度”，但也並未對張作出組織處理決定，而且這個決議也只傳達到中央委員一級。反觀張國燾，從阿壩格爾登寺會議到卓木碉會議，又是“開除”又是“通緝”，還打擊留在四方面軍中工作而又堅持北上的同志，甚至還另立中央，壞話說盡、惡事做絕，最後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自己把自己推到了“自絕於黨”的歷史對立面。

此後，即或是在張國燾另立中央之後，黨中央仍然以相忍為國的態度對張國燾好言規勸，希望他儘快率紅四方面軍北上。直到次年5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因估計張國燾有改變錯誤之可能，為了團結、爭取張國燾，使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

²⁶ 〈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1935年9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46頁。

北進甘南，政治局成員們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確定對張國燾“組織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受我們指揮”。²⁷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上後，張國燾又製造了一齣“槍桿子指揮黨”，擅自率紅四方面軍主力掉頭西進準備西渡黃河的“甘南風波”後，黨中央仍然對張國燾改正錯誤並在團結紅四方面軍廣大將士中發揮作用寄予希望。在1936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的發言是：

四方面軍擁護中央是有誠意的，對四方面軍應該有個整理，並且應該經過張國燾，才更順利些。我們應該幫助他，使他的進步更順利，並經過他將四方面軍整理好。工作怎樣去做？第一，任命他為前線指揮；第二，張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務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完成統一團結，將四方面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關於國燾過去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問題，原則上是不說的。但如說到時應指出：這一錯誤是嚴重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另一方面應指出是個別的、是機會主義性質的（對中央路線的估計不足），但不是整個路線的錯誤，因為就其整個歷史來說，還只是某個時期個別的錯誤。還有一點，如果他以後不再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將來不一定提這一錯誤，如果仍繼續發生這樣的錯誤，就是應與之作鬥爭的。²⁸

這種對待黨內分歧和鬥爭的態度，想不成為典範都難啊！

如果這都還不算仁至義盡，你說中央還能怎麼的？

不知數十年後那些指責毛澤東等“過分施心計於紅軍指揮權的控奪”的顛覆學問者，能不能敢不敢正視這些起碼的事實，以

²⁷ 〈毛澤東在1936年5月28日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轉摘自《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第367頁。

²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第649頁。

一個學者最起碼的公平心態來面對這些“起碼”的事實。甬跟那兒一驚一乍的扯浪頭叫撞天屈！——當了叛徒的張國燾要是都冤屈了，那紅四方面軍三過雪山三過草地留下的那些英靈哩？那慘死在“自己人”刀下的許繼慎曾中生曠繼勛們哩？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到了這種地步，請問這還有天理公道麼？這些顛覆學問者真的是在為紅四方面軍將士鼓與呼麼？張國燾與毛澤東，誰是真正愛護紅四方面軍將士的，誰是真正關懷紅四方面軍將士的，是誰在他們遭受失敗遭受磨難之後敞開心扉擁抱他們的，是誰帶領他們繞過急流險灘走向革命勝利的，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後人，難道真的不知道麼？難道真的是忘得一乾二淨了麼？就算他們中有不少人在文革中吃了冤枉遭了磨難，可那波及的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運動呀，有委曲的並不只是某個山頭某個方面軍呀！作為共產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後人，總還是要講一點黨性吧？不講黨性總還是要講一點良心吧？如果連良心都不講了，這人，還能是個啥？老百姓還能瞧得上你們個啥？數一數這些革命勝利者倖存者肩上的星光胸前的勳章，再想一想那些不知多少倍於這些星光勳章總和的那些犧牲者們失散者們，不妨捫心自問：這個黨這個軍隊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沒有給夠？

我就不相信紅四方面軍的將士和他們的後人們全都會被幾個小丑長期忽悠下去！

我就不相信！！！！